

中国
文学研究
年鉴 1987

ZHONGGUO
WENXUEYANJIU
NIANJIAN

ZHONG GUO
WEN XUE YAN JIU
NIAN JIAN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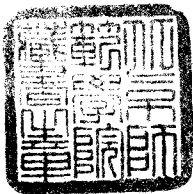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3103



中国文联出版社

21193103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工作人员

主 编 吕 林
副 主 编 赵远帆
责任编辑 陶国斌
编 辑 蔡田明
装帧设计 王 莜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7）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 × 1092毫米16开本44.25印张6.插页1043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精）1740册（平）2150册

*

ISBN 7-5059-0442-6/I·280（平）定价：15.50 元

ISBN 7-5059-0443-4/I·280（精）定 价：19.90 元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

主 任 何西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信

王俊年

王善忠

甘 粹

祁连休

吕 林

许觉民

沈玉成

何西来

赵远帆

徐公持

袁良骏

董乃斌

蒋守谦

樊 骏

NJ90/07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工作人员

主 编	吕 林
副 主 编	赵远帆
责任编辑	陶国斌
编 辑	蔡田明
装帧设计	王 莛

前 言

何西来

一

经过所内有关学科数十位专业人员和少数所外专家的共同努力，历时五个多月，这一期《中国文学研究年鉴》，总算编写定稿，可以付梓了。

象前两年一样，当我从头到尾仔细读完编辑部交来的全部有关稿件，签署了意见，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不仅因为，放在读者眼前的这本年鉴，比较真实地记录了过去一年我国文学研究各主要学科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其中也渗透着记录者的心血，有他们的欣慰、期望和评价在。

年鉴固然是编年性大型工具书，以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全面、尽可能客观的资料为宗旨，但编写者毕竟是活人，不是消极的镜子，因而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见解和倾向，也不可能不通过材料的选择、概括、编排，把自己的见解和倾向带进去。以各学科的研究概况为例（这是年鉴的主体部分），在写法上就带有述评性。“述”，也许可以客观，可以做到不露声色，但“评”却一定会表现出较强的主观倾向。在概况的述评中，我们强调的是“述”，而不是“评”，要求尽量多介绍些客观情况。这条原则，绝大多数编写者是掌握得比较好的。尽管如此，细心的读者仍不难发现，编写者们的选择角度，评价标准，即他们的主观倾向，是存在着某些差异的。有的差异还相当大。但这无妨。只要不是信口开河，反而会使文字不显死相。所以，我们也不要求述评者在观点上绝对的一致。“大一统”，并不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取。

算起来，这本《中国文学研究年鉴》，该是第七期了。第一期是一九八一年创办的，内容上包括了一九八〇年底以前四年的文学研究情况。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年鉴虽然只出了七期，却追踪、记录、涵盖了新时期十年的文学研究。十年，应该说是一个小小的单元了。

把这十年的文学研究情况，按照年鉴的记录，加以排比，尽管由于各学科具体条件的不同，可能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局部曲折乃至失误，但从总体的发展趋势来看，却显示出一条强劲有力的上升红线。在这条红线上，1986年是十年小单元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十年文学研究的上行梯级的最高一级。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自有其特殊的规律，谁也不能保证每一年都是丰收的。象庄稼人种田一样，碰上气候反常，风不调，雨不顺，也可能歉收。然而，本年度的文学研究，却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应该承认，是丰收的。

1986年的文学创作，在内容、形式和技法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与探索，却并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突破，虽然不能说没有进展，没有成功。相比较而言，文学研究诸学科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绩斐然。象上年一样，理论批评仍然处于最前沿。在它的带动下，整个文学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这种活跃，涉及的方面和问题很多，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三点：第一，围绕着刘再复文学主体性问题，展开了持久而又激烈的论争；第二，“文化热”的出现和它对文学研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三，学者们对于当代性的思考。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通向文学观念变革的总题目，互相之间，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果说，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标志着1986年文学研究的重要历史特点，反映了文学研究发展的宏观走向，这样的估计怕是符合实际的。

二

围绕着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与观念对立，形成了1986年文艺理论界的一场主要论争。论争一方的主要代表是刘再复，另一方的主要代表是陈涌。卷进这场论争中的中年文艺理论家，人数不少。此外，还有一批理论界的新人。这场论争，直到现在，还在持续。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有就这个问题写了文章，发表了意见的人，都可以简单地把他们划入对立的此方或彼方。事实上，不理睬论争双方的意见，避开对立，仅就主体性问题的某一方面发表意见者，亦大有人在。文学的主体性的问题，虽然首先是刘再复提出来的，也存在着不同意见的讨论（如《文汇报》组织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组织的讨论），但真正形成论争，却要从1986年4月《红旗》杂志发表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算起。应该说，这是新时期文学观念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涉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场论争，它的发展方向，不仅可以用来标示文学观念变革的方向，而且将引发人们作更深邃的思考与探究，从而加快文学观念变革的步伐，深化这一变革的内涵。

必须看到，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无论从刘再复个人的学术道路来说，还是从近几十年来我国文学发展的宏观道路来说，都不是偶然的。

刘再复的学术生涯，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他曾经对鲁迅的美学思想，进行过深入、系统的考察，那成果，便是《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在这本理论著作中，他不只是就鲁迅论鲁迅，而且渗透了很强的现实参与意识。例如关于文艺批评的真、善、美标准问题的论述，就既是对鲁迅批评观念的概括，也是对多年来把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强调到绝对化程度的“左”的偏颇的一种救正。鲁迅的使命意识，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鲁迅对于重建和改造中国人的灵魂的重视，鲁迅对于国民性的鞭辟入里的分析，都深刻地影响了刘再复此后的学术道路与学术品格。这就是说，鲁迅研究，既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一块基地，又是他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判断的重要源泉。因此，当他一旦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更广阔的一般文艺理论的空间时，他关注的对象也就不能不首先是人。当然，刘再复对于人在现实的历史生活当中的命运和在用想象编织的艺术王国的命运的思考，不能仅仅用鲁迅的影响来解释。在这里，也许反思几十年来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起着更根本、更直接的作用。然而，鲁迅的影响，毕竟不能低估。

刘再复写于1984年的《性格组合论》，其理论的聚焦点也只能说是人，即作品中人的性格的深层精神结构。虽然对这本书的某些论点，我不完全同意，也曾写文章同他商榷过。但是，在总体上，应该给这本专著以充分的肯定性评价。它是几十年来我国第一部专论人物性格的著作；它第一次摆脱了一味在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中来回兜圈子的没完没了的争论；它的理论锋芒，始终对准着人物性格塑造上狭隘的“左”倾观念；它的理论支点，是博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尽管在这本书里刘再复还没有全面提出文学主体性的理论构想，但这本书的内在逻辑却必然导向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因此，完成《性格组合论》的写作之后，刘再复便把他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文艺学领域。在对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的文学研究进行总体性的考察之后，他在《读书》1985年第2、第3期上，发表了《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在这篇颇有影响的文章里，他把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概括为四点：由外到内；由一到多；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同年4月，在扬州的文艺学和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上，他做了一个发言，又把这四点概括发展为六点，补充进由物到人和由静态到动态两条。这个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后经充实、整理，便是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这篇文章恰如它的题目所标示的那样，其核心部分是专谈文学主体性的。主体性的问题在这里虽然还没有作充分的展开，但有关的基本理论框架和范畴，都提出来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刘再复把他长期积累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思想，加以梳理和提高，作了必要的理论的和哲学的升华，写出将近5万字的《论文学的主体性》，连载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上。《论文学的主体性》就整体来说，仍然带有论纲的性质，但一些基本范畴和基本观点都有了比较充分的展开。因此，可以说，能够反映刘再复的理论主张。

从《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到《论文学的主体性》，我们粗略地勾勒了刘再复有关文学主体性的发展脉络。应该说，在刘再复的学术道路中，分明地贯穿着对人的关心和重视，活跃着人道主义的精神。这些因素强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他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因而，其理论的必然归宿，只能是文学主体性主张的提出和展开了。

然而，任何理论家的有影响的理论主张，都不可能完全是个人欲望的产物。他们总是站在一定的历史潮流之中，从各自生存的时代获得创造的灵感和力量的。同时，一切人类的创造，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不可能是平地楼台，都必然会有所承传。在上一本《年鉴》的前言中，我曾提到过文学主体性与50年代中期以来几度起伏的人道主义思潮，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内在承传关系等等。从这种真实而非杜撰的承传关系中，不难看出，文学主体性的问题，即使没有刘再复提出，也会由其他的理论家提出。因为，在这个问题的后面，存在着—股巨大的，生命力相当顽强的历史潮流。这股潮流，在近几十年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曾遭受了反复的摧残，时而流入地下，变成潜流，时而露出地表，奔腾咆哮。对于这股潮流来说，是刘再复还是别的什么人，提出文学主体性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肯定会被提出来。谁提出来，这是偶然的；一定会被提出来，则是必然的。刘再复个人学术思想的发展，恰好与这股强大的思想潮流相交汇，相契合，从而产生了剧烈的共振，放射出耀眼的闪光。这时，潮流仿佛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个人也似乎找到

了力量的源泉，这叫做“风云际会”。它是多种历史的和个人的因素偶然组合的结果，不是所有理论家都能碰上这样的机遇和幸运。其实，在新时期，第一个把主体性问题作为一个突出而紧迫的命题提出来，并从哲学上给以系统的说明和论证的，并不是刘再复，而是李泽厚。为了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二百周年，李泽厚写了《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一文，收入1981年出版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一书。数年之后，他又写了《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上。这两篇文章的问世，均早于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是刘再复观点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李泽厚的主体性，是从更广泛的哲学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它虽然涉及并包容了美学的层次，却并不就是刘再复稍后提出的文学主体性，当然也还没有刘再复“对象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那种三范畴的划分法。尽管李泽厚的哲学主体论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一样，是同一个历史潮流的产物，并且也引起了许多反响，但却不曾发展为如刘再复碰到的那样的论战。

无可讳言，作为理论文章，刘再复对自己的主张的阐述，确实存在着不够完备之处。诸如有的论证还可以更充分些；有些重要的理论中介环节被忽略了；有些观点强调得过了点；个别范畴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敲等等。然而，任何一种理论主张的最初提出，都不可能是完备的，更不可能严密到无懈可击。从不完备，到比较完备，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达到。应该承认，论争的对手确实抓住了刘再复文章的某些漏洞和弱点，就是说，人家抓住的有些问题，也不能认为就根本不是问题。然而，照我看，论争之起，主要并不是因为刘再复的文章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漏洞与弱点。退一步讲，即使刘再复有本事把自己的论点发挥得滴水不漏，围绕主体性问题的论战，怕也难免。因为，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是某些根本观念的冲突。而在整个变革的历史时期，新旧观念的冲突是带有必然性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常常是，要避免而不可得。对立的理论观念后面，往往有非常现实的利害关系和利害冲突。新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对立与冲突中，为自己的前进开辟道路，使自己逐渐成熟，走上完备，并最终证明自己的现实性和历史合理性；而旧观念，也将在这反复的较量与冲突中，耗尽它最后的生命力，变得僵硬、板结，完全失去它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这时，被抛弃的命运，也就到来了。

持续的，有时是激烈的论争，使文学主体性这个本来就十分重要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关切。为数众多的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这个问题进行着深入的专题研究。他们不以批判人，打倒人为能事，而是着眼于切切实实的理论建设。陕西师大的畅广元，就带着他的九名硕士研究生，从事于主体论文艺学的系统研究。这种在学术上和理论上的远见卓识，是非常难得的。文学主体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它需要许多人的研究和探索，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在这里，一个实实在在的建设性步骤，一次认真的探索，要比一百篇“大批判”文章有价值得多。

让人振奋的是，除了理论上的建设性研究之外，文学批评和各具体的文学研究学科也加强了从主体性角度对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现象的审视与开掘。雷达的《论创作主体的多样化趋势》，是一篇从创作主体角度总结新时期十年文学成就的宏观性批评文章。文章认为，从被动的自我，到主动的自我；从共我到自我；从自足的主

体，到充满矛盾的主体等，是新时期创作主体多样化趋势表现的几个重要方面。雷达的这篇文章，是较早地敏感到主体性角度的重要性，并自觉地把它运用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汪晖的《历史的“中间人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也是一篇很值得注意的论文。这篇文章以鲁迅对自我精神史的认识过程为中轴，通过对《呐喊》、《彷徨》里有关小说的分析，考察了这类作品的总体基调，内在精神联系，以及美学风格的演变。这种从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特征出发，从鲁迅对自己作为“历史中间物”的地位的自觉出发所作的探索，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它对多年以来的鲁迅研究模式，无疑是重要的突破与补充。林芝的《现代作家创作无意识趋向考索》，显然是对创作主体临文时的某种特殊心理状态所作的专题研究。无意识，是指一种非自觉的潜沉的心意状态，或潜意识。这种心意状态有可能与创作主体的理性主张相合，也有可能不合，但却在冥冥之中起着作用。林芝在这篇文章中对巴金的分析，对茅盾潜在的唯美倾向和浪漫主义倾向的分析，对柔石《二月》里萧涧秋和文嫂的七岁小女儿采莲的感情关系的分析，都因为选取了主体的审视角，而能够发人所未发。在古代文论研究中，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有关主体性理论的开掘与阐发。陈晓光的《〈文心雕龙〉文学批评主体条件思想探微》认为，刘勰是批评史上较早提出并阐发了文学批评主体条件的人，他用“识”来标志文学批评主体的条件。党圣元的《〈淮南子〉对于情感与审美之关系的认识》则断言，《淮南子》是把情感作为一种主体力量 and 人性因素来肯定的，而这种对于情感在创作和鉴赏中的重要作用的肯定，就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对于艺术的主体性的重视。类似的实例还可以举出很多。

总起来说，无论是对于文学主体性理论本身的建设性探讨，还是把主体性作为研究具体文学现象的重要审视角，去拓展研究的新领域，都有助于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从而推动文学观念变革的发展。当然，论争也是有益的，必要的，只要不乱扣政治帽子，不危言耸听或以势压人。

三

近几年来，文化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到1986年，可以说更上一层楼，形成了普遍的“文化热”。这种“文化热”的出现，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因素交相起作用的结果。文化是一个包容非常宽泛的综合系统。广义的文化，几乎可以说涵盖了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正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历史需要，把文化问题的思考，召唤到了历史的前台，引起了从上到下的重视。文化建设的总体蓝图如何勾勒；民族文化传统如何对待，哪些需要扬弃，哪些需要继承，哪些需要改造；还有，如何正确对待潮水般涌来的域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怎样评价，怎样吸收和借鉴；在这中外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汇中，到底应取何种对策，应以何者为主……这一切，都需要思索，需要给以明确的理论回答。面对着这些纷至沓来的问题，于是，从上海开始，许多地方召开了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请了各方面的文化人，出谋献策，集思广益；新上任的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也多次召集专门会议，倾听专家意见，对此进行研究，以期有所作为；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如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展开了很有声势，很认真的探讨。这股热潮在文艺界更是产生了强烈而

又广泛的回响，大大加速了文学观念变革的步伐。

近几年，文学观念的变革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冲击：一次是方法论的冲击，一次是主体论的冲击，还有一次，便是“文化热”的冲击。方法论的冲击，使文学观念变革找到了第一个理想的突破口，既不必冒大的风险，又事关全局，得手后可以迅速扩大战果。因此，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学观念变革，经过了创作实践和研究实践长期的经验积累，经过了小步骤的摸索和局部性的突破，直到方法论的提出，才真正迈开了大步，才真正上了路。主体论的冲击，是文学观念变革进一步走上自觉的标志。因为，提出文学的主体性问题，说明理论工作者不仅抓住了陈旧过时的文学观念的症结所在，而且看清了文学观念变革的宏观走向。至于“文化热”的冲击，则深化了文学观念变革的层次，扩展了文学观念变革的思路和视野。

席卷整个思想界的文化热潮，不仅学者、专家兴趣盎然，就是忙碌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也都参与进来。这样的热潮，在文学艺术界，是沿着三条主渠道流淌的，它们有分有合，时而在各自的方向上深入，时而汇成巨大的急流，漫过人们的头脑，发出震耳欲聋的喧嚣。不管分也好，合也好，它们在根本上都始终是声气相通的，互相支持的。这三条渠道，一是创作；二是理论批评；三是其他具体的文学和文化艺术研究学科。

创作是文学领域的实践方面，也是感应历史脉搏最快、最直接、最敏锐的部分。理论批评和其他具体文学研究学科，都不能不受其影响。更重要的是，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都必须以过去和现在的创作实践为研究对象，这是它们赖以竖立起来的基础，是它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文学观念的变革，虽然只有经过理论批评，才能展示出总体的风貌，才能走上自觉，形成新的严整体系，从而站稳脚根，扩大地盘，最终取代旧的观念体系，但它的最初的试探性的触角，却总是从创作实践中伸出去的。还必须看到，“文化热”虽然出现在1986年，到了这一年，才在文学领域的三条主渠道中都有了比较集中的表现，但这决不是在某一个早晨就从天而降，猝然而起的。事实是，文化因素的增加，文化角度的受到重视，文化意识的强化与自觉，作为一种逐渐积累的精神过程，早就首先从创作上开始了。

文学创作是以人和人的精神世界为描写对象的。这就有一个如何理解人及其活动环境的问题。已往，以唯阶级斗争论为基础的泛政治化的思维模式，把复杂的人性，人的社会性抽象到只剩下政治性，阶级性。人被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被归结为政治关系，阶级关系。这种看法，这种想事的方式，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人性和人物个性的泯灭。大量的作品，图解着被重复了一万遍的政治概念，而活动在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情欲的生命活体，而是各种政治概念的载体。他们没有人性，没有心肝，没有灵魂，是一些在读者面前晃来晃去空洞而又单调的文学僵尸。这种泛政治的思维模式，不符合迄今存在过的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不符合被现代科学所证实了的人的实际状态。在社会生活领域，它导致了人与人的相恨、相仇和相斗。所谓政治运动，^①就是这种相恨、相仇、相斗的普遍集中的形态。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其发展的极致。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导致了千家万户的悲剧。在文学艺术领域，它把创作推进了一条死胡同。应该说新时期的文学创作首先是从清算这种模式及其所造成的普遍灾难中，复苏过来的。

经过沉重的反省，揩去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泪痕，文学创作发现了完整的、丰满的、真正的人。在一些敏锐的作家眼里，人在逐渐恢复他的由多元因素组合而成的辉煌本质；就是在这同时，文化被发现了。人不只是政治的动物，他更是文化的动物。李泽厚对人的主体性所作的哲学解释，就主要是着眼于人们外部文化环境和内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可以说这样的解释，为创作实践中人的发现和文化的发现提供了很好的理论的支柱。如果说，在新时期文学的早期阶段，在方之的《内奸》，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系列小说中，作者们对他们笔下的田玉堂、李顺大，陈奂生等人物的由多种性格因素所组成的复杂系统的描写，已经不很自觉地包涵了某些文化因素的话，那么，汪曾祺以《受戒》为代表的作品，邓友梅的《那五》、《烟壶》等写得相当精致考究的作品，则显然取了较为洒脱的文化角度。这些作品中或描绘乡土风情，或状写文物变迁，掌故沿革，都多少淡化了，超越了政治的樊篱，而显出别一种风度。到了“寻根”小说的出现，作家们头脑里的文化意识便相当自觉了。寻根文学的作者们不仅写作品，而且发议论，意在为自己的实践做出理论的说明，或者其实主要是为了宣传，为了造成声势，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虽然寻根者的这些议论并无多大的意义，理论上的建树更说不上。然而寻根文学的创作潮流，却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获得了不可小视的实绩。阿城的《棋王》系列作品，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贾平凹的由《商州初录》打开闸门并作为代表的系列作品，韩少功的《爸爸爸》等都写得各具丰采。还有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也可以划入这个创作潮流。如郑义、张承志的某些作品。寻根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潮流相比，那种激越的政治热情显然消退了，冷却了。而且，在一部分作品中，出现了可以被误解为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和严重问题的倾向。历史背景模糊了，时代脉搏减弱了。这看起来很象是退步，以致使得一些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强的作家，不得不站出来大声疾呼，反对文学脱离时代，脱离现实人生。其实，这也许是过虑。如果不是局限于一隅，而是从新时期文学历史推进的宏观全局来看，我们会发现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虽然第一次真实地描绘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人的戕害，其揭露的锋芒是指向“左”的泛政治模式的，但是作家们观察和描写的角度，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主要是政治角度。而稍后出现，并蔚为大观的改革文学，发展到后来，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故事情节也都开始落套。这类作品之所以会形成新的公式化，原因也许很多，但审视生活的角度过于单一，却无疑是很重要的方面。任何一种创作潮流，到了落套，形成公式，相互重复，路也就走得差不多了。这时改弦易辙，另辟蹊径的任务，也就会很自然地提上日程，而新的创作潮流兴起的时刻也就到了。寻根文学的潮流，正是这样登上舞台的。它们最重要的进步，就是自觉的透视历史和人生的文化视角。无论是捕捉隐现于现代人心灵中的老庄风度和禅宗遗意，还是追踪三楚文化的原始根蘖和瑰丽奇姿，无论是探求秦汉文化的余韵，还是再现吴越文化的乡土魅力，都由于观察角度的变化而给鉴赏者带来了新意。因此，不要说寻根文学已经取得了公认的艺术成就，并且开始把自己的影响渗透到整个文学创作领域中去，以致出现了王蒙《活动变人形》、张炜《古船》这样的长篇，以及锦云《狗儿爷涅槃》这样的话剧，退一步讲，即使还不曾出现这样的实绩，也是文化意识的自觉，文化角度的采取，就是了不起的贡献。

创作实践中文化意识的自觉和文化视角的运用，推出了一批有较高审美价值而

又颇具新意的作品，这就给理论批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它不能不对这种现象作出系统的理论说明，给以科学的评价。应该说，批评家们并没有回避这个责任，他们的感应象作家们一样敏锐。例如，扬义在《当今小说风度与发展前景》中就指出，文化意识的崛起，是新时期小说走向开阔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说：“新时期的小说审美地发现了文化。儒道释交融互补的我国古文化既是两千年间维系民族不可磨灭的生命力的‘根’，也是拖累民族步履维艰的进取精神的‘根’。我们既要发现儒道释文化在心理沉淀的精华，以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力，也要以当代改革意识排除儒家的保守，道家的玄虚和佛教的空幻，使古老民族的根得以返老还童。新时期小说的未来发展，必然要把文化层次的逆向选择和顺向进取结成合力，以拓展开阔而深刻的新境界。”这是从分析文化寻根小说，特别是阿城的《棋王》等作品的长处和不足之后，引出的一段颇有历史见识的议论。这段议论，不仅涉及当前的创作实际的评价，而且预期了未来文化小说可能的发展方向与出路。陈思和的《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是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上专论寻根问题的。宋耀良的《意识流的东方化过程》，从文化交汇的角度，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来考察意识流的手法是如何被借鉴、被消化的。所谓东方化过程，就是意识流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被借鉴、被吸收、被消化的过程。宋耀良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借鉴、模仿；二是注意将心理描写与外部社会现实相揉合；三是进入注重表现民族文化心理。一旦可以比较自如地表现民族文化心理，意识流手法也就变成了民族文化系统中的一种新的组成因素了。其东方化的过程，亦随之完成。

经过文学批评的中介，文化意识在其自觉的历史行程中开始向理论领域升华。王元化就在《关于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文中，单立一个部分，专门讨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问题。他说，他在主编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时候，曾提出两条原则：第一，从比较中探索中国文学的特点；第二，从文化传统背景上来探索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这两点都是文化角度的考察。前一点立足于横向的中外文化的比较，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真正掌握中国文学的特点。后一点则是立足于文化传统的纵向沿革。王元化把构成民族文化传统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民族文化的创造力的特点；（二）民族心理素质；（三）民族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上的特点；（四）民族的价值观念。他还从这四个方面出发，就中国文学的总体特点作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吴予敏的《从文化角度看文学》，则是在“文化热”的冲击中，就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主体性等问题所进行的冷静的理论思考。他还评价了关于作品中文化特征的四中看法。都颇有见地。

创作上的突破和理论批评对这种突破所给予的肯定性评价，使前文化意识在其他具体的文学学科的研究中，也受到了比较普遍的重视。现代文学研究，是距当代文学批评最靠近的学科领域，它对“文化热”的感应，也远较古代文学研究等学科为快，取得的进展也大。本年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召开的《鲁迅与中外文化》专题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由于把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作为主要的研究参照系，着重探讨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评价，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等问题，而颇有进展。鲁迅研究中文化参照系的确立，对原有的研究模式是很重要的突破。因此，“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不仅是新的研究模式取得进展，得到承认的标志，而

且对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金宏达的专著《鲁迅文化思想探索》，赵景华的《鲁迅与郭沫若文化观略论》，都是从文化角度立论的。舒芜的《周作人概观》，是从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周作人的一生所做的观照，很有见地。这篇长到六万余字的文章，是把周作人的文学生涯和思想历程放在现代中国的总体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上进行评说的。作者指出：周作人身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中庸”，正是这“中庸”促成了他个人的也是这种类型的知识者的悲剧。这是颇为深刻的见解。

从特定的文化角度进行宏观的和微观的考察，使古典文学研究比较沉滞，比较单一的模式，也有了较大的变化。这在本年度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在《楚辞》的研究中，人们比较多地注意到了荆楚文化的地域特色，以及这种文化特色与屈原作品的关系。出现了诸如《试论荆楚文化特色及其与屈原诗歌的关系》和《从〈楚辞〉看楚族之风俗》一类文章。我疑心，这样的文化思考方向，是否从当前的文化寻根创作潮流及其理论升华中得到了某种灵感的启示呢？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着重于从一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来把握作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代表的作家个人的艺术特点，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无论从文化的地域特点出发，还是从文化的时代特点出发，去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都给一向比较狭窄的微观研究注入了宏观的因素，从而造成了开阔的研究格局。蒋述卓《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和刘梦溪《〈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都是从研究方法的高度看待文化问题的。他们认为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才可望突破本学科的原有格局，翻出新意。周明的《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忧患意识”》，选定了文化心理意识的一种特定的形态，作为着眼点来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某一方面的特点，进行宏观的分析与把握，其关注重点不在外部文化系统的参照，而在内部文化因素的开掘。余秋雨的很见功力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是把戏剧史作为整体文化史的一个子系统进行描述的。吴予敏的《刘勰文学“通变观”的历史文化考察》是对刘勰美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的深入研究。由于这种研究仔细地考察了“通变”观念在与文学有关的文化领域的特定内涵及其历史演变过程，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等问题，所以就能比较科学而又准确地把握刘勰“通变观”的全部理论内涵和历史内涵，就有很强的说服力。吴予敏对于一个具体理论范畴的考察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深度，固然与他比较扎实的文化知识结构，特别是中国思想史的素养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现代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帮了他的忙。

总之，从文学研究的全局来看，一方面是来自整个思想界的“文化热”的冲击与推动，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研究本身，由于文化意识的自觉，也出现了相应的“文化热”。这种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热”不仅成了整个思想界的“文化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促进着整个思想界“文化热”的发展与深化。至于创作实践中文化意识的加强对社会，对成千上万读者心灵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

四

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文学当代性的思考，是本年度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在其推进中所表现出来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文学的当代性不仅涉及文学创作，而且涉及

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诸学科。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当代性所指为何？我们在众多的理论批评文章中，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当代性这个概念，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差异很大，还有相当一些人，只是把它作为现成的提法来使用，并不对它的内涵作清楚的界说。照我看，所谓当代性，就是指当代精神，或今天的时代精神。它要求文学和史学研究能够渗透现代人的意识，从而具有鲜明的现代精神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性与现代性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是相同的，或接近的。文学的当代性的概念，有其历史的具体性。它是永恒的发展过程的一个被假定为暂驻的环节，是这个环节被实践主体感应到，体认到的精神特点，它的一端连着过去，一端续着未来。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代性的核心，应该是变革意识，开放意识，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现代科学意识和作为它的自觉表现的使命意识。需要说明的是，文学的当代性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指导下所把握到、捕捉到的时代精神，不应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有人把倡议文学的当代性，视为用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欲施之讨伐，这是错误的。必须看到吸收西方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吸收和改造西方社会科学思想中某些被证明具有生命力的合理因素，对于实现我国的四化事业，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性，都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就是自缚手足。

加强文学的当代性或现代性，既是文学现代化的已往行程的结果，又是它所要追求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理想。文学现代化的问题，首先是在现代文学学科被提出来并加以探讨的。论者把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来考察。著名现代文学专家王瑶，在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中认为，“文学现代化”的问题的提出，是研究观念上的重要突破。他说，这个现代化“包括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应该说它是把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特质包括在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揭示现代文学本质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是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王瑶的这篇文章，是一位老学者面临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前进时的回顾，既是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也是回顾一代现代文学研究家的学术道路；回顾之中又有前瞻。他之所以称文学现代化概念的提出为“又一次思想解放”，正是由于他从这里看到了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

樊骏在其长篇论文《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有着与王瑶大致相近的看法，但却作了更深入、更充分的展开。他也认为，现代文学学科是从对自己已往的历史行程的反思中，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个反思发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需要补充的是：这是一个反思的时代，是一场持续的灾难过后整个一个时代的历史反思，是对人的、国家的、民族的命运的反思。作为这种反思的艺术表现的，是“反思文学”的潮流的兴起。包括现代文学学科在内的学术界的反思，都不过是这个反思的时代的部分精神表现罢了。经过这样的反思，现代文学学科才真正找到了与新的时代的契合点，从而找到了通向自身新的发展阶段的通道。在学者们的努力之下，现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格局、方法、着重点等，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与调整。樊骏把新的现代文学观的提出，视为这个学科的研究具有当代性的最重要的标志。他说：“这些年里，我们对于这段文学历史开始形成新的解释：着重从中国

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和作为现代意义的文学来把握和分析评价。”他进而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结束了文学上的古典时代，在初步出现了现代化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在有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又掀起了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新的高潮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受到来自西方的现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力推动，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崭新的历史进程。文学的现代化，包括了从文学语言到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审美情趣，到思想内容的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面深刻的变革和创新。这意味着对于作家作品不再只是从政治的、革命的角度出发，而是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不限于思想剖析，还有美学评价。”樊骏是从时代历史条件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必然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制约出发，看待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对现代文学学科在研究上的深刻变化进行了仔细的考察与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研究者的基本观念，考察问题的角度和眼光，取舍褒贬的方面和要求，都是与今天的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不只是消极地纠正过去的错误，或者弥补原先的疏漏，更重要的是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对于文学历史作出新的探讨和评价，是这个时代才能有的社会思考和文学思考。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由于研究者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氛围和历史条件之中，他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他们的显意识和潜意识，都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当代性。尽管如此，这种当代性还是有自觉和非自觉的区分。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自觉的当代性。另外，还应该看到，一个时代的精神流向是相当歧异的，有的甚至尖锐对立，而只有代表了，反映了历史前进方向的精神潮流，才是当代性的真正内容。因此，当代性只能是人们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层次之后，从新的历史的和思想的高度上，对于过去已经凝固了的文学史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自觉地对于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现代文学学科，也表现在其它学科。当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这种呼声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就是古代文学学科，今年也出现了栾勋《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这样的把当代性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上进行探讨的论文。这篇文章把当代性简明地归结为“就是用当代人的眼光去研究古人的问题。”什么是当代人的眼光？栾勋通过（一）一个值得思索的历史现象；（二）功利性与功利主义；（三）当代性与当代主义；（四）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五）通和变的关系等几个重要方面，作了细致的论述。然而，照我看，所谓当代人的眼光，其实主要就是改革的眼光，开放的眼光，摆脱了“左”的单一政治模式的眼光。

我把使命意识也包括在当代性的诸组成要素之中，目的是为了说明追求着当代性的研究主体在这方面的高度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使自己的研究能够从时代的变革大潮中获得力量，从而开创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新的学术局面；二是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够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作用，成为推动变革的文化动力，而不是纯粹书斋里的东西。因此，完全可以说，在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后面，跃动着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火热的报国之心，是愿意自觉肩负起历史重任的责任感。

五

1986年的文学研究可以说异彩纷呈，以上所谈三个方面，远不是它的全貌。而且没有涉及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失误和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本年度值得注意的动向颇为不少，但我却把前面的三点看得更重要些。另外，研究工作中当然不是没有应当予以改进的偏颇和失误，但它们多半是一个学术昌明的时代在前进中难以避免的，何况主流始终是健康的，充满希望与生机的。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一年的文学研究，有本年鉴提供的资料在，有已经变成了历史的研究实际在，读者只需开动自己的头脑，稍费翻检之劳，是不难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的。

关于本期年鉴的具体编辑工作，还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一）为了加强各具体学科的基本情况的介绍，我们增加了概况的份量。只要可能，我们尽可能把有关学科的概况，根据其所涉及的问题的性质、角度和侧面的不同，分为若干专题。专题之下，又酌情加了小标题。并在总目录中做了提示，以便读者翻阅查找。（二）有些新增加的专题，如“女性文学研究”，“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特征讨论”等，因为以前不曾在年鉴中涉及，故在编写时虽仍以本年度情况为主，却也向前作了必要的追述，以便读者对该专题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印象。（三）本期年鉴在有些学科，如现代文学学科，鲁迅研究学科的概况中，加强了对于有关专著的介绍。但这一点在各学科间做得并不平衡，以后当继续加以改进。（四）各学科概况介绍之后的论文选摘有所加强。所摘篇目较前为多，但相对每篇字数有所减少。所收论文，或提出了新见，或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能反映学科所达到的水平。另外，新书的评介也有所加强，标准略同于论文选摘。但这里又比论文多了一层麻烦，除专著本身水平外，还有评论者的水平问题。不过我们主要是看前者。对于新书评介一栏，各学科的有关程度也不平衡。总之，无论是论文摘编，还是新书评介，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五）本期年鉴在索引部分增添了《中国文学艺术研究工具书综录》的内容，希望对于文学研究工作者能提供某些方便。

本期年鉴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我们深知，无论在编辑思想和编排方式上，都还存在不少可以改进之处，诚恳地希望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正。

1987年6月26日